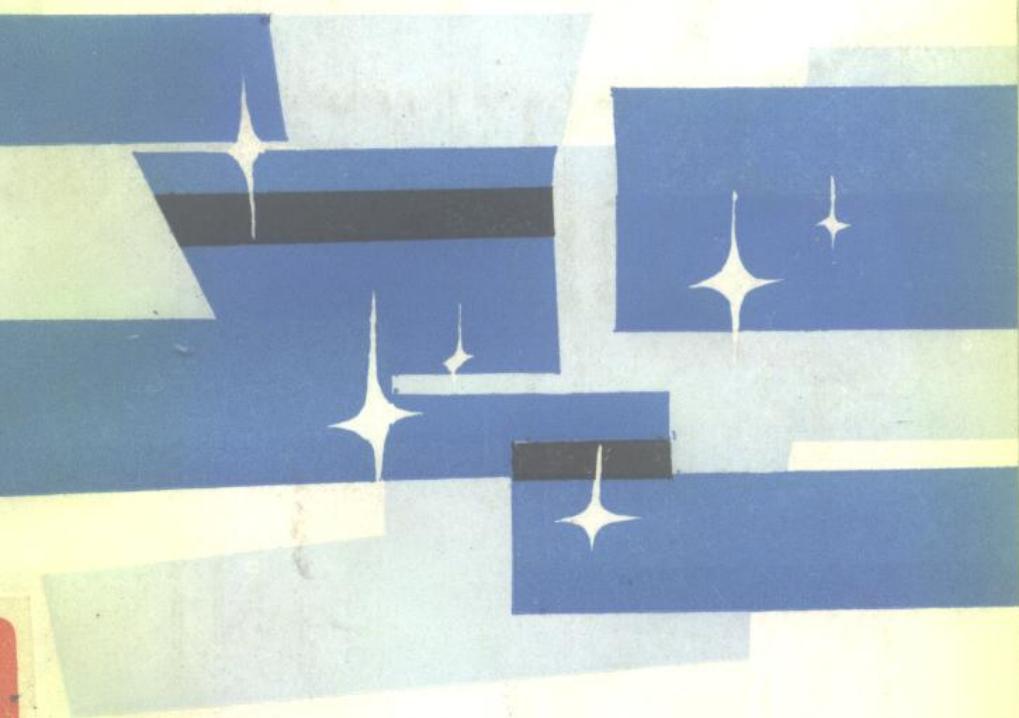


程树榛 王敬文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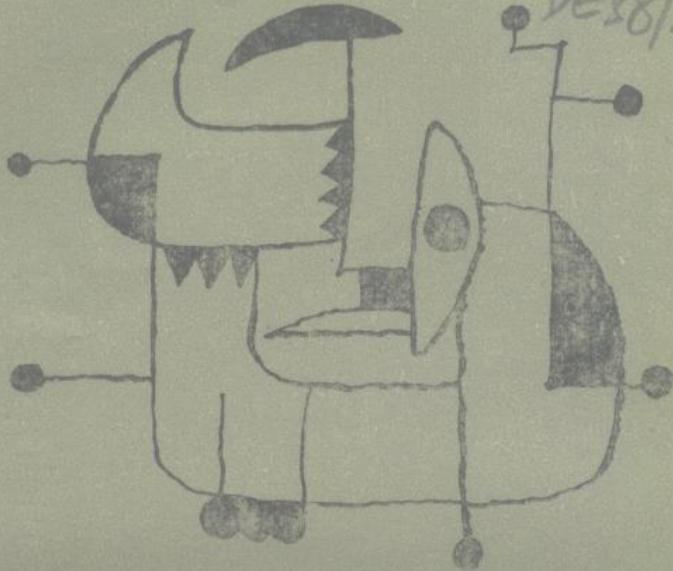
中国文史出版社



吉星高照

——改革者的闪光足迹

DE 18/33



吉星高照

改革者的闪光足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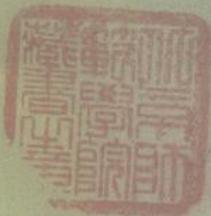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68680

1168680

程树榛 王敬文 著



吉星高照
——改革者的闪光足迹
程树榛 王散文 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87×1092毫米 32开本 9.625印张 2插页 198千字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8400册

*

ISBN 7—5059—0567—8/I·356 定价：2.15元

目 录

吉星高照.....	程树榛	(1)
——黑龙江化工厂的兴衰和厂长刘颉治的命运		
“东轻”的回声.....	王敬文	(41)
冰城之光.....	程树榛	(69)
一位青年改革家的奉献.....	崔永泰	(97)
未经剪辑的故事.....	刘国明	(124)
青山常在人未老.....	王敬文 史连瑛	(138)
——记桃山林业局长卢守安		
敢于胜利的人.....	乘电弧 黄 瑞	(168)
在逆境中站起来的改革者.....	王敬文 史连瑛	(185)
——记宝清县建筑工程公司经理郭铁城		
塞外奇葩.....	程树榛	(218)
胶城曲.....	刘国明 宋文华	(269)
尊严.....	崔永泰	(283)

吉星高照

——黑龙江化工厂的兴衰和厂长刘麟治的命运

程树德



曾经有人断言：黑龙江化工厂要是能够变亏为盈，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对于这话，在几年前的富拉尔基公民中，信者居多，不信者甚少。因为人们亲眼看到这个乱糟糟的大型化工企业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几起几落、乃至奄奄一息的破败形象。连三岁小孩都说：这个厂没救了！

可是到了公元1986年年底，忽然从“黑化”（黑龙江化工厂的简称）传出一个惊人的消息：全年盈利866万元，它的产品不但畅销全国，而且打入了国际市场；全国有十几个省市的农业部门订购“黑化”的化肥，日本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商人争先购买“黑化”的焦炭……

这个消息许多人听后不禁为之瞠目结舌，他们怀疑：难道太阳真的从西边出来了？

对此，“黑化”的厂长刘颉治作了很好的解释：不是太阳从西边出来，而是这几年“黑化”有吉星高照——是党的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使“黑化”起死回生、并展翅起飞了；否则，它在那屈辱的泥潭里早就被溺死了！

了解“黑化”历史的人，无不赞成这位精明能干的社会主义企业家的话。他是最有权威的见证人。因为“黑化”的兴衰和刘颉治的坎坷命运是紧密的结合着的。

轰轰烈烈的上马，悲悲惨惨的下 马，一上一下引起人们几多喜忧

1958年，在“大跃进”的锣鼓声中，黑龙江化工厂在嫩江之滨被达斡尔族乡亲称之为“红色之岸”的富拉尔基破土动工了。在大放“高产卫星”的高潮中，据说，省的某位领导也想把它当作奇迹来创造的，扬言半年施工、半年安装、半年投产——又是一颗卫星！

当时，刘颉治正在北满钢厂（今齐齐哈尔钢厂）当一个车间的党支部书记。他和富拉尔基的绝大多数居民一样，从心眼里是不欢迎这座工厂的出世的。因为当时的红岸上空已被三家大工厂（鼎鼎大名的第一重型机器厂、号称龙江工业神经的富拉尔基热电厂，以及全国唯一的生产特种钢的北满钢厂）的如林烟囱日夜所喷吐的滚滚浓烟所笼罩，空气中弥漫着一氧化碳有毒的分子；嫩江的水面上，漂着一层厚厚的油花儿，被阳光照射后，映出五颜六色的斑斓波纹；连潜藏

在江桥下面深水层中孕育成长、一向以肉嫩味美的鳌花鱼，嚼起来也有一股扑鼻的煤焦油味儿。红岸人家已尝够了空气污染的痛苦，谁还想再添一个听见名字就感到害怕的“污染源”——化工厂？因此，人们都暗暗在心里祷告：阿弥陀佛！这个“黑化”还是远点去吧！千万别……然而，领导的决心已经下定了：建设“黑化”，是大跃进的需要！刘整顿和富拉尔基（包括全中国）所有的公民一样，是富有牺牲精神、是最能顾全大局、是把国家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因而，默默地也是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个无情的现实——黑龙江化工厂如期破土动工了。那时候，在70余公顷的厂基上，也着实热闹了一阵子。从四面八方调集来的一千多名建设大军，在省工业厅一位副厅长的率领下，掘土的掘土，修路的修路，打地基的打地基，盖厂房的盖厂房……但是，没过多久，“大跃进”违反科学规律所遭到的惩罚，也无情地降临到“黑化”的身上。到了1961年，在耗资1754万元巨款之后，再也干不下去了。在“关、停、并、转”的大调整中，它有幸加入“停”的行列。从该年三月份开始，建设全线停止；工程封闭，设备封存；2800名职工，本着“择优选择”的原则，被齐富地区的工厂企业所“瓜分”，实在没有去处的，下放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厂内仅留下37人，用来看管仓库和现场。偌大一个建设工程，就这样被莫名其妙的“自然灾害”吞噬了。人们不会忘记“黑化”职工和工厂依依惜别的悲情感景：他们或用大卡车载着全家老小，或用自行车拖着简单行囊，或牵着小毛驴驮着随身衣物：或挥泪而去，或握手而别，各寻出路，各奔他乡。不过，人们理解国家的困难，既不怨天，也不恨地，而是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但

是，这个心灵的创伤却是深刻的。在奔赴新的生活途中，无不暗暗祈祷：这种误国害民的“大跃进”，千万别再光临中华大地了！那时，作为这个倒霉的工厂的“紧邻”一个车间的头头，刘颉治亲眼目睹了此种凄凄惨惨戚戚的场面，也曾发出不少廉价的感叹；但是，他决不会料到，15年后的一天，他的命运竟会和这个夭折的工厂结下不解之缘。

话说到了1966年春天。经过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的5年之后，中国人民以坚韧不拔的精神，战胜了大跃进结出的苦果——三年困难时期所带来的灾难，国民经济又走上全面复苏的道路。被人遗忘了的黑龙江化工总厂，又被省计委的领导摆到会议桌上了：根据本省工农业发展的需求，有必要复建这个化工厂。据此，有关的省、市干部，又被派往已经沉睡5年的建筑工地；和他们同来的还有当年被“瓜分”到其他单位的原“黑化”职工。他们分别5年，重新聚首，心中是怀有某种苦尽甜来的希望的。

可是，“黑化”总是流年不利。复建的锣鼓尚未敲响，却被同年夏天铺天盖地而来的“红色风暴”所吞没了。“文化大革命”的狂飚一下子就把这个不堪一击的工程碎为齑粉。造反派的勇士们，视几千万人民币的资财如玩物，一会儿停了，一会儿建了，停停建建，建建停停，直到1976年，才勉强建起一座四邻无靠的“光腚炉”——一号炼焦炉。当时，在富拉尔基流传着这样一套顺口溜：

黑化黑化，听了害怕；
建厂十年，成绩伟大：

两根钢轨，一根“大蜡”。

两根钢轨指的是匍匐在厂区不足百米长的“铁道”，那根“大蜡”是对矗立在红岸上那个最高的大烟囱的形象描绘。由于煤气每天以上万立方米的流量是从烟囱向外散出，被火点燃后象一根巨型蜡烛。它从春到夏，从秋到冬，日日夜夜大放光明。有人曾经计算过这根“大蜡”的“经济效益”：相当于一个工人站在烟囱旁持续不断地将票面为拾元的人民币扔进火里。名副其实的触目惊心。

不仅如此，遍布厂区的是枯枝败叶，荒草野藤，家兔和狐狸共居，奶牛和山羊同栏。从五湖四海汇聚而来的300多户人家，住在这没有遮拦的“大院”里。他们耕于斯，住于斯，食于斯，养于斯。连烧饭用的木炭，取暖用的煤，都无偿地从无人看管的仓库中“领取”。各取所需，随用随拿。据不完全统计，每年丢失的煤块达5000余吨。因此，富拉尔基的民间诗人为“黑化”作了非常形象的描绘，诗曰：

黑化工厂，有厂无墙；
有墙无门，有门无人。

多么生动的写照！

刘韵治就是在这种时候、在这样的条件下来到“黑化”的。从此，他的命运便系在“黑化”这只沉重的破船上，而驶向一条极不平静的航道。

又倔又硬，死不悔改， 被“造反派”一脚踢开

刘颜治本是辽宁省阜新县一个穷苦农家的孩子。他早年丧父，和寡母弱妹相依为命。16岁时，便挑起全家生活的重担，和不幸的命运进行顽强的抗争。一方面，维持一家三口在饥寒交迫中不致成为饿殍；同时，还在附近一所简易师范就读，以求立身之本。新中国成立后，新的生活唤起了他新的希望，怀着报效祖国的一腔赤诚，投笔从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年戎马生活，锻炼了他顽强的性格与果敢精神，本想在疆场上建立一番功业，讵料胃病复发，无法适应军营生活，只好转业地方，分配到正在兴建中的北满钢厂工作。新的岗位变成他新的学校，他努力工作，勤奋学习，很快他由工段团支书升为车间党总支书记、转而又提拔为厂政治部副主任。是最年轻的厂级干部。20余年，鏖战钢城，栉风沐雨。山峦般起伏的厂房，留下他辛勤的足迹；奔腾的钢铁洪流，熔进他智慧的汗水。当那场史无前例的民族大劫难到来时，理所当然，他也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戴高帽，游大街，蹲牛棚，挨批斗，哪一回也少不了他。有一次，造反派对他进行触及灵魂的批判，连钢管都打弯了。他这个具有30余年党龄的老党员，饱尝了“无产阶级专政”之苦。当年的北满钢厂，是齐市“文化大革命”举足轻重的单位，造反之激烈，斗争之复杂，是全国闻名的。读者还记得九大“选举”的中央委员中有个名叫“忘八蛋”（实际名叫王白旦）的其人乎？人杰地灵，这位大人物就出在这家工厂，而

刘颤治又恰恰是他的死对头，其遭遇就可想而知。在钢厂的当权派中，刘颤治年纪最轻，受审时间最长，挨打最多，吃苦头最重。有一次，造反派挟持着他从富拉尔基到齐齐哈尔向市委请愿，对他进行了长达近百华里持续两昼夜的旅行批斗，创斗争“走资派”的新纪录，在黑龙江省几乎是家喻户晓的新闻。不过，这个又倔又硬的小个子共产党员，硬是死不认罪，死不悔改。本厂“造反派”老爷终于对他绝望了，就在1976年邓小平第二次下台，“反击右倾翻案风”掀起新高潮时，刘颤治被一脚踢出钢厂，以示惩罚。这就是他流落到“黑化”的由来。

初到黑化时，任他为“第五把手”的党委副书记。

不识时务，不知深浅， “五把手”自愿“下地狱”

如果刘颤治是个营蝇苟狗，不思进取的人，他完全可以坐在党委办公室那第五把交椅上，每天泡上一杯茶，捧起一份《参考消息》，悠哉游哉地享受一番“文革”给人们带来的无所事事的清福，或者象另外一些人那样“在大喇叭里抓革命。在家里木工台上促生产”；当干部的谁还自讨没趣充当“唯生产力论”的典型人物？

可是，刘颤治又一次扮演了“不识时务”的角色。来“黑化”不久，他竟主动提出要求：去焦炉车间蹲点。

焦炉车间是个什么地方？

按说，焦炉是“黑化”的关键设备，前一阶段工厂的主要资金都甩在它身上了，一座焦炉就是好几千万元。当时的

这座焦炉是什么样呢？工人形容它是：七窍生烟，八下冒火，奄奄一息，苟延残喘；生产场地则是浓烟滚滚，尘雾漫漫，一片火海。来这儿干活，被称作是“下地狱”。在“地狱”里的都是哪些人呢？首先是“文革”中“犯了错误”的干部；其次是家庭出身不好的“臭老九”，个人历史有疤痕的老工人；再就是调皮捣蛋的青工，不得新贵眼瞅的保皇派。用有些人的话来形容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

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刘颤治非要去蹲点！他的哪根神经出了毛病？

一些好心的同志纷纷前来劝告他：“老刘，那是个啥地方？你要求去！搞不好，会落个一身不是！”“这年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可别踩那个是非之地！”“那个鬼地方又脏又累，不是人呆的，‘老一’‘老二’不打这个头，你这个‘老五’干嘛要去现大眼呢！”

可他不但不听，反而拿自己那至死不悔的老调门去顶撞人家：“见困难不上，还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干着累趴下我心甘情愿，不干就趴下，我办不到！”

人们拗他不过，只好由着他。

焦炉工人都用异样的目光望着这位“五把手”。有人在窃窃私语：“这家伙大概是犯错误了，要不他来这儿挨烟熏火燎？”还有人这样预言：“兔子尾巴长不了。哪个当权派愿意吃这份苦！瞧着吧，过不几天，他就得鞋底抹油——溜掉！”

听了这些话，刘颤治既不恼怒，也不辩解。兀自披着那身油渍斑斑的工作服，戴一顶熏得发黑的安全帽，骑着那辆混身都响就是铃儿不响的自行车，每天比谁来的都早，比谁

走的都晚，风雨不误，雷打不动。

蹲了将近两个月，刘颤治心里有底儿了，他打算迈开第二步：改造焦炉进而改造“黑化”。恰在这时，“四人帮”倒台了，中国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为他实现自己的宏图提供了新的契机。

炉子是人操作的，要改造焦炉，当然要在人的身上打主意。问题是需要看准了。

他首先看准了转业军人刘宗升。这是个身强力壮、充满青春活力的共产党员，他是焦炉车间的团支书。

“小刘，你来组织个青年突击队吧！”刘颤治对刘宗升说，“焦炉糟蹋到这种地步，不采取点特殊措施怕治不好；如果把青年人组织起来，形成一股突击力量，打几个歼灭战，一定会很快改变现状的。”

刘宗升还保持部队里那股敢打敢拼的闯劲，早就对焦炉的现状不满了，一听此话，正合心意，因而满口应承。当即挑兵选将，举贤任能，几天之内，就把第一个青年突击队组织起来。当他向刘颤治汇报时，“五把手”高兴地说：“好！说干就干，军人本色没有丢！我也报名参加，当个老突击队员吧！”

果然，人们经常看到，在那群生龙活虎的青年人进行突击劳动时，有一个矮个子中年人，头戴披肩帽，身穿石棉衣，脚踏防热鞋，全副武装，象古代武士一样，和青年们一同操作。只见他一会儿钻进炉膛内换炉柱，一会儿爬到炉顶扫大盖；在修补炉膛时，他和工人一样，冒着6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从仅有450毫米宽的炉门钻进钻出，稍一不慎，眉毛

便烧焦了，身上会燎起泡。他就是刘颤治。由于他身先士卒，突击队员也都争先恐后，奋不顾身。他们说：“人家党委副书记都这么干，咱们有啥说的！”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刘颤治在实践中又一次领悟了革命导师这句名言的真谛。

突击队强劲地干了一阵之后，焦炉生产有了明显的好转。

“七窍生烟、八窗冒火”的状态算是暂时治住了，但是，流油、跑焦、泄气现象，仍时有发生。这说明焦炉的毛病还没得到根治。不过，这些混身是劲儿的突击队员对此也束手无策了。每天上班后，围坐在焦炉旁，一个个望炉兴叹。刘颤治为此大伤脑筋。整治焦炉，他是向党拍了胸脯的，决不能半途而废啊！于是，他又开动了脑筋。冥思苦想，好几天也没想出个好办法。难道是山穷水尽了？

柳暗花明，他找到了 解决难题的新途径

原来他发现了两个人才。

第一个是大连工学院毕业的张玉石。这位年轻的技术员，由于投错了胎，竟出生在一个剥削阶级家庭。从未见过面的地主兼资本家的祖父把倒霉的血统传到了他的身上。在大连工学院念书的那几年，他是个“老运动员”，一直是受批判的“白专”典型；一进“黑化”厂门，便被打入另册，发配在焦炉车间劳动。张玉石已经尝够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对这种惩罚性劳动，毫不感到意外。“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习以为常了。每天神情麻木地上班下班，扒

渣、运焦、搜煤……领导叫干啥就干啥，够得上合格的“驯服工具”。他对生活已经不作任何苛求，只盼将来的某一天，在此“炼狱里”脱胎换骨，取得一个工人称号，永远摘去那顶“臭老九”的帽子。此愿足矣！

没曾想，党委副书记却对他发生了兴趣，怪哉！

刘颉治是在无意中“发现”张玉石的。一天，刘颉治在工人体息室发现一本专门讲述炼焦工艺学的厚厚的书，他翻了翻，感到它的内容很解渴，有的地方他还啃不透。奇怪，这儿的工人怎么会啃这样深的业务书呢？他拿起书来问了问，无人应承。私下里他又挨个儿询问工人，有个小伙子悄悄地告诉他：这是张玉石的。他常常偷偷地看这本书。

“他看得懂吗？”刘颉治怀疑地问。

“咋看不懂，人家是大学毕业生哩！”

刘颉治这才知道：在这样不起眼的地方，还藏龙卧虎呢！只怪自己工作不深入，缺乏一双具有敏锐穿透力的慧眼，没有及时地发现。那么，现在已经发现了，就不能再让其埋没了。

于是，他去找张玉石促膝谈心。刘颉治象一个小学生似地，真诚而又虚心地向张玉石请教。希望这位大学毕业生能为治好焦炉的久治不愈的顽症献计献策。那时，刚刚粉碎“四人帮”，“凡是派”还在那儿喋喋不休地“批邓”、“反右”，张玉石余悸未消，因而把心灵的大门紧锁着，对书记的请教虚与委蛇。但刘颉治却锲而不舍，虔诚以待。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经过多次交谈后，张玉石深深感到，这位“五把手”和别的政工干部不大一样。他平等待人，词诚意恳，所思所想，都是为了工作。加上平日的观察，他被刘颉治感

动了。以诚对诚，披肝沥胆掏出了心里话。

听了张玉石谈了对治理焦炉的建议，刘颤治茅塞顿开。感到此人确是胸有沟壑，目光远大，系有用之才。因而竭诚地向党委推荐，希望对张玉石委以重任。党委接受了他的建议，作出决定：任命张玉石为焦炉车间副主任。

张玉石做梦也没想到他会有这么一天。难道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他不敢相信这个事实，而去找刘颤治。他说：“刘书记，这样使用我是不合适的。您知道我的情况吗？”

“正因为知道你的情况才用你的！”刘颤治坦率地回答。

“我家庭出身不好。”

“党的政策哪一条规定：家庭出身不好就不能为社会主义出力了？”

张玉石心想：是没有成文的规定。但这些年不一直按这个不成文的规定办的吗？否则，我这个学化工的大学毕业生怎么会窝在这儿？不过，这话他敢说出口吗？

刘颤治却替他说了：“老张，过去那不正常的一页掀过去了。从现在开始，你放开胆子干吧！你是社会主义大学培养出来的人，为什么不该信任？希望你拿出主人翁的劲头来，干出点成绩，让那些戴有色眼镜的人开开眼。我相信你不是个窝囊废！”

一席话，说得张玉石心头热乎乎的。他拍案而起：“刘书记，蒙您信任，我心领了！那就看我的实际行动吧！”

张玉石的实际行动，使刘颤治颇为满意。他不仅帮他改造好了焦炉，在此后的工厂改建、扩建与科研活动中，大大发挥了作用。而今，张玉石作为党员副厂长，正和刘颤治共

同驾驶这只“航船”，乘风破浪，扬帆远航。提起当年起用他时的情景，张玉石总是感慨万端地说：“用我这样的‘危险人物’，刘厂长是冒着很大风险的啊！”

冒着“风险”启用“危险”人物，何止张玉石一个。秦承先的被提拔重用，至今在“黑化”仍被传为佳话。

这位身高1.80米的关东大汉，“文革”中受极左思潮影响，是“黑化”最早起来造反的“风云人物”之一。理所当然，在工厂的大权被造反派夺取之后，秦承先也登上了炙手可热的权力宝座——成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委员之一，而且身负“大批判”的重任；不用说，批走资派、斗牛鬼蛇神，他成了奉命坐镇充当统帅的重要角色。当粉碎“四人帮”进行揭批查时，秦承先是重点审查对象；顺理成章，他也被发配到焦炉车间接受惩罚性劳动。

秦承先应该是没有怨言的；但在经过烟熏火烤、拖着疲惫之躯走回家里的时候，他也不无懊丧地想：我这辈子算完了。“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下半生没个好了。

没想到刘颉治却看上了他。

在经过多方调查与考核之后，“五把手”找到了这位前革委会委员谈谈心。刘颉治问他：

“秦承先，你对以前所犯的错误怎么看？”

“我是后悔莫及。现在整天吃后悔药过日子！”秦承先愧疚地说。

“吃后悔药是消极的；积极的态度是振作起来将功补过！”